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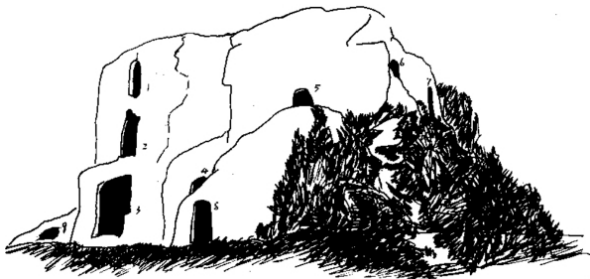
# 论太原龙山道教石窟的开凿

□ 刘 江

龙山石窟(图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位于今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处,《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成化)山西通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太原府志》、《(顺治)太原府志》、《(康熙)山西通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太原府志》、《(道光)太原县志》等明清文献均有所记载。以上文献,除《永乐大典》外,均将龙山石窟主体的修建年代系于元贞元初(1295年)。但是石窟保存有五处时间明确的题记,覆盖的时间范围为:1234~1239年;三通有关龙山石窟修造主持者宋德方的元代碑铭<sup>[1]</sup>则将此系于1234~1236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山西龙山石窟概说》中将其系于1234~1244年间,陈少丰认为建于1234~1239年间<sup>[2]</sup>。龙山石窟的修造年代在学界存在巨大分歧,对其进行梳理与探讨,对研究全真教的发展以及道教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石窟造像本身为基础,结合全真教的早期发展情况,对石窟各窟的开凿或完成时间作一简单整理,并对石窟开凿的原因及意义等略作分析。

我们首先对有明确时间题记的最早的第1窟进行讨论。

第1窟,其名字略有争议,但通过该窟的题



图一 龙山石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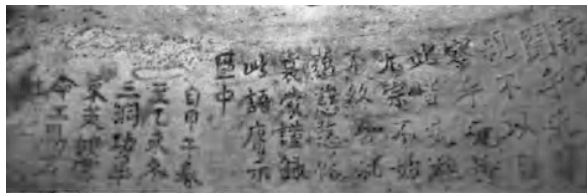
记(图二)内容可以确定,历代文献以“虚皇龛”命名是比较合理的。该窟的题记内容为:

唐吴尊师,玄纲论曰:□地不能/□有有天/□□□极/□□不能/□□运太/□□真精/□□自然/□□惟明/呈□□九清/□□玄化/□□万灵/□以之动/□以之宁/□默无为/□方用成/□洞之前/□虚靡测/□□澄正/自此而植/神真独化/□□□□/□□□□/咸有所职/丹台瑶林/以游以息/云浆霞饌/以饮以食/其动非心/其翔非翼/听不以耳/闻乎无穷/视不以目/察乎无极/此皆无祖/无宗不始/不终舍和/蕴慈愍俗/哀蒙谨录/此语庸示/区中自甲午春/至乙未冬/三洞功毕/东莱披云命工勒石<sup>[4]</sup>

可见,题记内容的来源标示明确,来自唐吴筠所作的《玄纲论》,《正统道藏》收录了该文,本窟题记为其上篇《明道德》“真精章第三”的起首部分,据此可将题记所引部分阙漏补充完整为:

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极。太极不能自运,运太极者真精。真精自然,惟神惟明,皇曰虚皇,高居九清,乃司玄化,总御万灵,干以之动,坤以之宁,寂默无为,草方用成。空洞之前,至虚靡测,元和澄正。自此而植,神真独化,匪惟巨亿,仰隶至尊,咸有所职。丹台瑶林,以游以息,云浆霞饌,以饮以食,其动非心,其翔非翼。听不以耳,闻乎无穷。视不以目,察乎无极。此皆无祖无宗,不始不终,含和蕴慈,愍俗哀蒙。<sup>[5]</sup>

作者认为“虚皇”是“高居九清,乃司玄化,总



图二 第1窟题记局部



图三 第4窟正壁主尊像



图四 第5窟正壁主尊像

作者认为“虚皇”是“高居九清，乃司玄化，总御万灵”的至高神灵，对其无边法力倍加推崇，因此，此窟命名为虚皇龛是没有异议的。作为作者推崇的最高神灵，属下也应有众多神仙，本窟除了主壁的虚皇造像外，两侧各有十尊造像，虽然我们尚无法弄清每一尊造像所代表的神仙，但是虚皇属下的神仙则确凿无疑。有的学者，如史岩<sup>[6]</sup>、胡和文<sup>[7]</sup>，认为该窟造像内容为丘处机与十八学士及李志全、秦志安的说法则显得牵强。

该窟题记末尾“自甲午春 / 至乙未冬 / 三洞功毕 / 东莱披云泐石”。对于其中的“三洞”，常盘大定以及胡和文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三洞”是道藏的代指，其根据是披云子宋德方生前主持整理了元刊《玄都道藏》，表面看来是合理的，但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该窟建成的“乙未”为蒙古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而史料明确记载，“（乙未，1235年）九月，（时任全真掌教的清和真人尹志平）达平阳，分命披云宋公（德方）率众镂道藏经板”<sup>[8]</sup>，而宋德方正式动工则是在1237年<sup>[9]</sup>。重辑《道藏》工作的完成则在1244年。也就是说，在此窟完成时（1235年冬），重辑《道藏》的工作还没有实际开展，因此，此处“功毕”的“三洞”绝不是指“道藏”，而是实实在在的龙山石窟中的三洞。这三洞石窟除了第1窟之外，其他的两窟我认为应当为第3、第8窟。

首先，第2窟、第6窟、第7窟都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分别为：丙申岁（1236年）五月、七月，己

亥（1239年）秋、丙申岁（1236年）十月。那么，我们再来看完工时间不明确第3、4、5、8窟。这四窟中，第4、5两窟应该就是古昊天观故址的二石洞，这两窟里面保存的数尊造像与其他窟有明显区别：

（1）第4（图三）、第5（图四）两窟相较于其他窟的造像面部显得过于丰满，略显臃肿，与其他造像即使丰满但不臃肿，神韵上亦有所区别。

（2）主尊造像的胡子，在整个石窟群中，除了这二窟之外，其他窟造像的胡子均为型，飘至下颌，或至胸口，没有八字胡。

（3）两窟的头戴的冠，虽然时间过于长久有所风化模糊，但是与其他窟造像莲花冠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4）从手部造型来看，第4窟正壁主像右手举似作施印式，左手抚膝；第5窟双手手心向上，重叠于小腹前。而其他窟的造像则或笼手或拱手不见手指。

（5）从正壁主像的台座形式看，两主像台座为各自独立的方形，而其他窟的台座则为连续型台座，其纹饰与第4、5窟也大不相同。

（6）从造像的风化等影响来看，第4、5窟的造像明显比其他各窟严重，五官由于时间过于长久而模糊不清。

因此，第4、5窟就是宋披云所发现的“二石洞”，既然是古窟，那就是先前道教信徒的作品，其造像内容也就是先前道教所崇奉的神仙。

确定第4、5窟为古石洞，那么剩下的两窟只能是第3、8窟。从日本常盘氏发现石窟以来，第



图五 第3窟正壁卧像



图六 第3窟卧如龕右侧问道弟子上半身像

8窟只有泥塑造像台基,我们仅能对第3窟的内容进行探讨。

据文献记载,第3窟卧如龕(图五)“为披云子卧化地”,即此像为宋德方,那么,开凿时间当在其去世之后,两尊站像是李志全和秦志安,但此窟实际开凿于1234~1235年间,那么卧像就不是宋德方。对第3窟内容的认识,如果我们将第1、2、3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有新的认识。第1窟造像道教至高神尊——虚皇天尊。第2窟略有异论,有的学者认为正壁的三尊像是三天师,但全真教自创立以来就未曾见到其任何崇奉天师的记载,因此,此说不能成立。我们从题记内容来寻找线索,左壁题记:

披云创凿石室 尊□披云之老仙,占龙山之□,凿千寻碧玉之岩,幻数洞黄金之像。玄台共汉月争高,杰阁与晨霞相抗。幸百灵之拱卫,亘万劫而无量者也。/丙申岁(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七月初九日/门人 舜泽 秦志安述<sup>[10]</sup>。

右壁题记:

岁在丙申(1236年)五月丙辰朔,总真玉室,庄严庆成,谨作祝文。大道窈冥,孰诘其形,至人体奥,立象尽情。爰穴盘石,焕以金碧,万神来思,载欢载悱。祭酒披宣,祈□□□,□恩祝延,当今天子,亿万斯年,次及臣佐,嵩呼庆贺。风雨若时,生灵安妥。门人李志全述<sup>[11]</sup>。

从题记可以看出,修造此窟是为了“□恩祝延,当今天子”的,所祈求的当然是道教地位很高的尊神,如三清。再者,题记中“总真玉室”,也可

看出此窟造像的神仙为三天之境的高仙三清,即三天的代称。

可见,第1、2窟所刻造像均为全真道或者道教信仰的重要神仙,那么与前两窟为一体的第3窟也当为全真道的神仙或祖师,那么,根据1235年之前的全真教发展情况来看,此像只能是全真祖师王重阳或者将全真发扬光大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但是鉴于后来开凿的第7窟“玄门列祖龕”中雕凿了全真七子的形象,第3窟卧像为王重阳的可能性更大。再者,从其造型来看,卧像所着衣服为当时北方普通民众打扮,王重阳为全真道教祖师,度化七真后不久即离世,教团的正式成员寥寥无几,因此对于信徒的服饰制度等未有严格要求,而丘处机作为北方宗教首领的全真教甚至道教的首领,其装束当然得有道教的风格,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此像为王重阳的推测。两位问道的弟子,左侧头部造像头像已不存,我们无从判断其身份。右侧脚部的弟子头部虽残,但面部清晰可见,白净无须的男性(图六);第7窟玄门列祖龕七真中丘处机的形象也是无须,见下文详解;《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中丘处机的形象也是无须(图七),再者尹志平曾谈到丘处机为“炼魔”而“一番净身,自险死”<sup>[12]</sup>,因此,该窟右侧问道者当为丘处机无疑。除了将全真教发扬光大的丘处机外,另一个有资格站在王重阳造像前的则当为丹阳真人马钰,王重阳的大弟子,全真教第2任掌教。因此,将第1、2、3窟综合起来看,三窟造像的都是全真教崇拜的最高神仙和祖师,宋披云开凿



图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中丘处机像





图八 第7窟正壁造像

这些造像就是为了宣扬教义和祖师的丰功伟绩，以促进教派发展。

## 二

按照三通元代有关宋德方的传记碑记载，从1234~1236年的三年间宋披云的主要精力用于修造以古昊天观为基础的龙山石窟，1235年冬修造完第1、3、8窟，1236年7月第2窟三清窟完工，之后修建的是第7窟玄门列祖龕（图八），雕凿了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的造像。虽然是王重阳开创了全真教，但真正将全真教发扬光大的是全真七子，他们用“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sup>[14]</sup>，使全真教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统治者的认可，尤其是丘处机与蒙古统治者的合作则使全真教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宗教第一派，全真教徒在各地积极修建宫观，招徕信徒，使全真教最终形成了“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sup>[15]</sup>的鼎盛局面。由此可见，七真成为全真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他们造像也在情理之中。七真的后学又以他们为祖师开创了不同的派别：嗣马钰者为遇仙派、嗣丘处机者为龙门派、嗣谭处端者为南无派、嗣刘处玄者为随山派、嗣王处一者为昆崙派、嗣郝大通者为盘山派、嗣孙不二者为清净派。

该窟左右两壁均有题记，左壁铭文：

祖堂赞：石室镌玉，祖堂绘金。功超往古，德冠来今。无与功遂，年随德（深）。警尔后学，无（忘孝志）。

右壁铭文：

三载洞府功毕，铭曰：道泰时昌，洞宫载缙。伟有神仙，从石壁出。丙申（1236）应钟（十月），祖堂功毕。勛哉披云，有光先德。

题记对祖堂的建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盛赞祖堂建造得宏伟、辉煌，对于追念先祖和警戒后人都有重要作用，并且对宋披云建造石窟的精深功德大加赞赏。由此可见，此题记非宋德方本人及其门人所作，从当时全真教的情况来看，教内能站在如此高度评价宋德方者，唯有其时任掌教的师兄尹志平。因此，史岩的推论是合理的<sup>[16]</sup>。

现在此窟七真的头部造像保存下来的仅有左壁的刘处玄和右壁的孙不二（图九），其他头像已被盗。根据日本常盘氏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当时正壁三尊的头像保存尚完整，有的学者认为正壁的三尊造像中间者为丘处机，左右分别为马钰和谭处端<sup>[17]</sup>。此说不确。本窟右壁的孙不二造像女性特征明显，正壁左侧造像虽无须，但亦肯定为其他六真之一，加之如前所述，先前开凿的第3窟丘处机面相为无须，则本窟正壁左侧无须造像为丘处机无疑。

由于实现了与蒙古统治者的合作，丘处机对全真教发展的贡献巨大，在后世的许多七真图像中都居于突出位置，甚至最重要位置，所以我们很容易将本窟居于正中的造像认为是丘处机的，但这是我们后来人的看法，忽略了当时全真教的发展及宋德方的师传等具体情况。从全真教的早



图九 第7窟右壁孙不二像

期发展来看,虽然丘处机对全真教发展的贡献突出,但马钰是王重阳的大弟子这一点,在教内是无可争辩的;且王重阳临终时托马钰督促师弟,尤其是丘处机修行,因此,马钰在教内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在对教团发展的贡献上,王处一与金朝最高统治者来往密切,多次受邀为金朝皇帝进行斋醮,为全真教发展初期争取政府认可做出了极大努力。从当时教团的发展情况来看,全真教内除了丘处机一系的弟子在积极修建宫观等,其他如马钰系的于志道、杨明真,刘处玄系的于道显、崔道演,郝大通系的范圆曦、王志谨等在各地民众中也都拥有一大批信徒,具有极高的威望。从宋德方的师传来看,其最早师从刘处玄,后得度于王处一,占道士籍,刘处玄去世之后才问道于丘处机,因此,我们很难界定他具体属于谁的门下。此类情况在早期全真教内比比皆是,如尹志平先后求道于马丹阳、丘长春、“复讲易原于太古(郝大通),究道妙于玉阳(王处一)”。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传统即将其划入某一人门下,并且认为其将置其师于突出位置。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当时全真教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在玄门列祖龕正壁中间的也不是丘处机,而旁边无须者为丘处机。

### 三

最晚完工的是第6窟,据题记可知该窟的修造时间是1238年春至次年秋,正壁雕凿的是宋德方像(图一〇)。18该窟雕凿的主像为宋德方,可以从题记中看出:

披云自赞/这个形骸许大,已是一场灾祸。被谁节外生枝/强要幻成那个。更分假象真容,便是两重罪过。/只因眼病生华,毕竟有个甚么。/自戊戌(1238年)春至己亥(1239年)秋工毕。

这一则题记表明窟中主尊是宋披云像,虽然在自赞中,宋德方表现很谦虚,但是为之造了像这一事情还是确凿无疑的。另一则题记,则是其弟子秦志安对宋披云高深道德的称赞:

披云仙翁,玄门中龙。德如之何,太华之峰。节如之何,徂莱之松。九龄悟道,遍体琳宫。千里求师,密契真风。/阐化于阴山之外,续琼章于火劫之中。炼谭、马三阳之镜,铸丘、刘八极之钟。玉



图一〇 第6窟正壁宋德方像

树重芳于海上,金莲复秀于山东。真待养成千岁鹤,一声铁笛紫云中。/门人 舜泽秦志安焚香敬赞。

“续琼章于火劫之中”一句点出了宋德方重修道藏的丰功伟绩,为全真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作为门人弟子的李志全、秦志安等才为其造像纪念。

此窟中存一小童造像,宁俊伟认为是何志渊<sup>[19]</sup>,其根据为“师(何志渊)来往汾、晋间,适故天师宋公(德方)阐教于彼,因得而师事之”。但仅仅成为宋德方的弟子,并不足以成为可能为其造像的原因。何志渊,生于1196年,参加了1237年在平阳举行的贡举并且得中甲科,后从披云入道。宋德方重辑《道藏》时,“令师(何志渊)雠校,兼领并门钧天局,其余七局皆隶焉,授以讲演之职”<sup>[20]</sup>,可见,何氏在《道藏》修撰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何志渊与龙山石窟开凿有其他联系的情况下,也很难说明此小童即何志渊。

修建道观、开造石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是宋德方及其弟子门人兢兢业业,花费三年的时间,在古昊天观二石洞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6窟新龕,形成了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规模宏大的龙山道教石窟。龙山石窟的开凿似乎是道教宿命论的结果,丘处机带领十八学士从西域归来住在燕京(今北京),对宋德方说:“汝缘当在西南。”刻于1274年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

行之碑》更是编造了先兆梦境：“真人假寐之际，神空山中所见，颓垣废址而已，既又览之，则楼阁壮丽，非人间所有。”<sup>[21]</sup>其实，从深层次来讲，龙山石窟的修造是全真早期鼓励教徒广建宫观的结果。修建宫观等宗教活动场所，是教团吸引民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丘处机为了全真教的迅速发展，向尽可能多的地区深入，倡导“服勤苦曰打尘劳”<sup>[22]</sup>，“打尘劳亦是功”<sup>[23]</sup>，命令弟子赴各地修建宫观，在当地建立根基，为全真教后来的鼎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龙山石窟是披云子宋德方在偶然发现的第4、5两窟古洞龛基础上，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先后修造了第1、3、8窟和第2、7窟，这些洞龛的造像主要是道教信仰的重要神祇以及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及其两大弟子，是为信仰和纪念而用。宋德方的弟子为了宣扬宋德方为全真教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又雕凿了以宋德方为主尊的第6窟，并且请时任掌教的尹志平写了题记。宋德方及其弟子修造龙山石窟，是受当时全真教迅速向各地扩展势力的潮流影响产生的，为全真教在当地吸引信众和教团势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研究道教石窟造像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 为刻于1262年的《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刻于1274年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与刻于1320年的《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分别见《道家金石略》（陈垣编纂，文物出版社，1988年，下文所引本书均此版本）547页、613页和753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龙山石窟”条，张明远的《龙山石窟历史文献勘误》（载《美术观察》1997年第10期）一文亦赞同此说法。

[3] 本图引自张明远《龙山石窟考察报告》，载《文物》1996年第11期，本文所讨论各窟编号均以此图为本，但根据各种迹象来看，本图中的第9窟没有造像，所以本文对此窟不予讨论。本文所用图除标明出处外，均为常盘大定于20世纪20年代拍摄照片。

[4] 以李养正《龙山道教石窟有关问题初探》（载《中国道教》1981年第2期）为基础，结合其他记述整理。

[5] 《道藏》，文物出版社等，1984年，第23册第674~675页。

[6] 《龙山石窟考察报告》，载《新美术》1980年第2期。

[7] 胡和文《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8] 《玄门掌教尹宗师碑铭并序》，《道家金石略》第568页。

[9] 《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丁酉（1237年）复往平阳主醮事后，遂与门人通真子秦志安等谋为钁木流布之计。”见《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10] 《披云创凿石室颂》，《道家金石略》第471页。

[11] 《总真玉室祝文》，《道家金石略》第468~469页。

[12] 《真仙直指语录》卷下《清和尹真人语》，《道藏》第32册第441页。

[13] 此图作者2009年7月间拍摄。

[14]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37页。

[15] 《重显子返真碑铭》，《道家金石略》第476页。

[16] 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

[17] 《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53页。

[18] 对于此窟，张明远在《龙山石窟历史文献勘误》一文中认为是王重阳向刘处玄、丘处机二真传道，而门中小童为宋德方。

[19] 宁俊伟《论山西太原龙山道教石窟》，《中国道教》2006年第5期。

[20] 《乐全观记》，《道家金石略》第652页。

[21] 《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22] 《提点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692页。

[23] 《真仙直指语录》卷下《清和尹真人语录》，《道藏》第32册第44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